

# 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场“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此案记载,并借此了解这场晚清科考对少年鲁迅的影响。

其中有物,不便拆开,便搁置桌旁,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第三种说法: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因船上官吏役人来回,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传话叫送信人稍候。陶阿顺在岸上等到不耐烦了,便大叫起来,惊动了船上众考官,殷如璋只好拆信,丑闻公之于众。

## 无奈去自首

周福清在船上等候回音,陶阿顺却一去不回。几个时辰过去了,提心吊胆的周福清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开船离开了苏州,暂到上海躲避起来。

在案发地苏州,知府王仁堪命令衙役将陶阿顺严加看管,并不时提讯一番。可是,陶阿顺“供词闪烁”,难得实情。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信函一同解交涉案人所在地浙江。浙江巡抚嵩骏十分重视,立即委派按察使赵舒翹会同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府知府陈璠一同办理,接连提审陶阿顺,并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周福清躲了一阵子,于八月下旬返回原籍。这时,他已成为官府通缉的要犯。陶阿顺在浙江受审时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信内何事,伊实不知”。嵩骏等认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为此,赵舒翹命令仁和、钱塘两县秘密访查,得到的呈报是,周福清“未曾来省”。赵舒翹又“飞飭会稽县原籍”,命令该县一旦发现周福清,“迅速查传,押解省垣质审”。此时朝廷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在这种情况下,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便投案自首。他当即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

## 大狱蹲八年

周福清归案后,先由知府陈璠进行第一轮审讯。接着,刘树堂和赵舒翹“藩臬两司会审”。最后,由巡抚嵩骏亲审。

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嵩骏于十一月初十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后来光绪帝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是“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等到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被减刑为“牢固监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被获准释放。这样,他一共蹲了8年的大狱。

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衰落。周福清入狱不过3年就去世了。周用吉不仅举人没当上,其秀才功名也被革除,挥不去的伤感和耻辱致使他刚刚35岁就死去。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从小康跌入困顿,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冷酷。然而,后来的鲁迅却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庆幸,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跌落和坎坷,影响了鲁迅的少年生活乃至性人格的形成,这正是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对一代历史名人的影响吧!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民国时赫赫有名的女县长们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顺应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潮流,在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不少女性涉足政坛,其中有好几位担任女县长,甚至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贵州,也产生了息烽女县长。

## 王孝英 演讲招亲的奇女子

1927年3月26日的《北洋画报》载有《王孝英女士趣闻》一文,谈到她演讲招亲的逸闻趣事。她上大学以前即有无数男子向她求婚,王提出,求婚者必须登台演讲,她亲自前往鉴定,然而“闻者咸莫敢尝试”,只有一位曾经留学东京的教育部职员欣然应约,当时听者云集,演讲者鼓其如簧之舌,尽其所有之才,希望博得女士青睐及台下掌声。不料才几句话,王冷笑离席,扬长而去。此文附有王孝英的头像,并有“南国屏藩”之语,且用英文说明:福建南屏县长,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禁止跳舞,引发舞界风潮。1947年,广州市政府决定,营业性舞厅自10月1日起一律停止营业。禁舞令遭到舞业人员极力反对,甚至举行所谓千人大会,呼吁政府延期禁舞。当时,王孝英既是国民党中委、立法委员,又是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和粤妇女职业促进会负责人。面对舞女代表声泪俱下的恳请,她表示:“跳舞为高尚娱乐,但在总动员令下,前方战士杀贼,后方民众自应吃苦。故禁舞势在必行,目前问题为禁舞后的救济办法。”又说已经与市长商定,计划分三期禁舞,至年底禁绝,从而使舞女取消了到市府排队请愿的原定计划。王孝英还与其他人一起,托人向当时坐镇广州的宋子文说情,希望市政府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王孝英说,广州舞女总数超过5百,一个舞女养活5口之家,一下禁绝,又不能马上转业,于是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者,总数超过三数千人,因此她表示:“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市政当局终究答应禁舞展期。转业舞女再就业培训开始后,王孝英担任班主任,训练内容包括编织、会计、家政等。

## 郭凤鸣 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

1930年的《北洋画报》载有《女县长轶事》一文,其中提到郭凤鸣擅长演讲,又能运用国语,听众听她演讲,几乎可以忘倦。有一次在北平演讲,一位听众直言不讳向她当面指出,县长演讲妙矣,惟不适于大会堂,因为声音太低。郭凤鸣于是效仿唱戏者之调嗓,每天到一个叫做陶然亭的地方练习,持续苦练一个月,“每晨呀哇一片声中,极少人知有女县长在也”。后来,郭凤鸣嗓门特大,以致“不知凤鸣是女娘也”。

为何要强调郭凤鸣能讲国语?因为她是四川人。在南开大学就读时,就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是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的成员,建议增设募捐股,并将五卅及其他亡国惨剧编为新剧演出,以期警醒国人,并且挨户向市民募捐,向市民演讲沪案情形。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郭立诚,曾将郭凤鸣考上大学一事作为妇女解放的典型,视为自己求学路上的偶像。

郭凤鸣还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曾经与张赴川参加会议。1935年,蒋介石致电张伯苓,希望他到重庆参加禁烟委员会总会第一次常委会。张伯苓等人先到上海办事,稍后搭乘民生轮船公司“民权”轮入川。著名作家和史学家陈衡哲旅途曾经邂逅张、郭一行,在其《川行琐记》一文中说:“在船上发现了张伯苓先生,他是要到四川去的。还有一位郭凤鸣女士,乃是张先生的得意女弟子。”郭凤鸣担任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曾赴天津一带督治旱灾。1929年,天津静海一带相继发生蝗灾和水灾,郭凤鸣以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身份前往视察,督治蝗灾,她不辞跋涉之劳而亲赴各县。郭督治蝗灾忠于职守,津县所管辖的贵庄和排地一带,本已出现蝗虫,但津县尚县长竟未呈报和组织扑治,郭以民生为重,毫不客气地向省民政厅如实汇报,导致尚县长被严厉申斥,转而积极治理蝗灾。因此津县人民对郭非常感激。

郭凤鸣还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曾经与张赴川参加会议。1935年,蒋介石致电张伯苓,希望他到重庆参加禁烟委员会总会第一次常委会。张伯苓等人先到上海办事,稍后搭乘民生轮船公司“民权”轮入川。著名作家和史学家陈衡哲旅途曾经邂逅张、郭一行,在其《川行琐记》一文中说:“在船上发现了张伯苓先生,他是要到四川去的。还有一位郭凤鸣女士,乃是张先生的得意女弟子。”郭凤鸣担任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曾赴天津一带督治旱灾。1929年,天津静海一带相继发生蝗灾和水灾,郭凤鸣以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身份前往视察,督治蝗灾,她不辞跋涉之劳而亲赴各县。郭督治蝗灾忠于职守,津县所管辖的贵庄和排地一带,本已出现蝗虫,但津县尚县长竟未呈报和组织扑治,郭以民生为重,毫不客气地向省民政厅如实汇报,导致尚县长被严厉申斥,转而积极治理蝗灾。因此津县人民对郭非常感激。

郭凤鸣担任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曾赴天津一带督治旱灾。1929年,天津静海一带相继发生蝗灾和水灾,郭凤鸣以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身份前往视察,督治蝗灾,她不辞跋涉之劳而亲赴各县。郭督治蝗灾忠于职守,津县所管辖的贵庄和排地一带,本已出现蝗虫,但津县尚县长竟未呈报和组织扑治,郭以民生为重,毫不客气地向省民政厅如实汇报,导致尚县长被严厉申斥,转而积极治理蝗灾。因此津县人民对郭非常感激。

郭凤鸣担任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曾赴天津一带督治旱灾。1929年,天津静海一带相继发生蝗灾和水灾,郭凤鸣以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身份前往视察,督治蝗灾,她不辞跋涉之劳而亲赴各县。郭督治蝗灾忠于职守,津县所管辖的贵庄和排地一带,本已出现蝗虫,但津县尚县长竟未呈报和组织扑治,郭以民生为重,毫不客气地向省民政厅如实汇报,导致尚县长被严厉申斥,转而积极治理蝗灾。因此津县人民对郭非常感激。

## 乌静彬 家世显赫的王妃县长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所谓“制宪国大”。参加国民大会的一名女代表,身段高大健壮,面庞丰腴清秀,总是穿着黑呢旗袍、平跟皮底鞋。此人便是乌静彬(1914—1975年),蒙古族。1946年8月,新疆省民政厅推荐乌静彬代理靖县县长,认为她“志虑忠纯,学验俱优,在蒙族中素著声望,以之治理和靖县政,洵属适当之选”。

乌静彬家世显赫,出身王府,又嫁入王族。原籍内蒙古喀拉沁右旗,其父贡桑洛布,系清代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世袭亲王,也称贡王。其母善坤,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姐,人称皇家三公主。1930年,贵为公主、年方16岁的乌静彬与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满楚克札布结婚,成为福晋,即王妃。

1932年,乌静彬开始协理公务,并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从此蜚声新疆政坛。两年后,满楚克札布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新疆顾问,她随夫移居乌鲁木齐。1937年,其夫被盛世才逮捕监禁,她全面署理土尔扈特部落事务。在迪化女子中学学习期间,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班主任黄颀对其影响较大。她努力学习,拥护抗日,参加街头宣传,并担任学生会会长。与此同时,她动员各部落家族支援抗战,捐献黄金、白银、马匹、牛羊等。她一度萌发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之念,并抵达兰州,但因时间关系和她所处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原因,未能遂愿。1944年,乌静彬组织和靖县代表团赴乌鲁木齐,向主持新疆政务

的吴忠信保释汗王入狱,后又率团到重庆,向蒋介石控告盛世才迫害汗王的暴行,并三次上书蒋介石,要求恢复王室,恢复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蒋介石于1946年初批示,由新疆省政府处理。1947年7月,经南京蒙藏委员会认可和新疆省政府批准,乌静彬召集旧土尔扈特南路各旗首领、苏木头目、喇嘛寺上层人士及民众代表170余人开会,正式宣布恢复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满汗王带病出任盟长,乌静彬任副盟长。

## 许芳媛 身陷桃色新闻的县长

许芳媛(1915—1951),贵阳人,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毕业后在达德学校任教。1937年与贵州省银行副总经理孙伯陶结婚,先后担任贵阳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国民党贵阳市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

1946年贵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非常激烈,派系纷争残酷。国民党国大会议召开,贵州各派系头头齐聚南京,秘密协商,以拥谷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核心,对贵州政权进行了分赃式安排,傅启学提名许芳媛为贵州立法委员候选人,引起其劲敌陈明仙极大不满。陈明仙脱离CC派,与《力报》社长李思齐等人独树一帜,并且以《力报》及其副刊《西南风报》为阵地,对许芳媛进行攻击。

《力报》总编辑曹儒森是20世纪30年代贵阳名噪一时的记者,笔名“小钢炮”,与李思齐是老朋友,互相欣赏,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竞选白热化的时期,全力支持陈明仙。在许芳媛和陈明仙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曹儒森写出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稿件,内容是简略叙述早年他与许芳媛相恋,后又不睦,并说许芳媛如何勾结人对他进行迫害,最后他在贵阳无法安身,逃往昆明,现在他已重返故土,旧恨未消,要控告许芳媛。曹儒森酒醒以后,觉得所写稿件有不妥之处,便要撤回,谁知印刷厂早已排好版,无法换稿。第二天《力报》发报,门市部门庭若市,很快销售一空。曹儒森发表这条新闻后,得到陈明仙派嘉许,鼓动他“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曹抛出长文,即所谓的“一首写不完的诗”,详细叙述他与许芳媛的恋爱史,轰动贵阳。

许芳媛无可奈何,只好在她富水北路的住宅中,邀请几位与她较熟悉的记者去便宴,她丈夫孙伯陶也在座。席间,许承认,她早年确实与曹儒森谈过恋爱,但并非如曹所写的那样无聊,而且她也并未对曹进行过迫害,纯属诽谤等等。许又告诉大家,她并不想举行记者招待会来申明,认为是非自有公论。据说,李思齐也承认曹对许的攻讦过分,曹儒森事后也很内疚。

1947年,许芳媛因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竞选未得省党部支持,竟然登报脱离国民党,辞去省党部委员等职,并与其他不满竞选人员发起组织反包办阵线,进行竞选之争。杨森为平息这一事件,委派许芳媛出任息烽县县长,成为民国时期最后一位女县长和民国贵州第一位女县长。

杨棉月 周石峰《文史天地》